

《周易》認為，事物是運動的，是發展變化的，事物內部的矛盾運動和對立統一盡在於陰陽之間的相互作用，所以人們在觀察和認識客觀事物時，必須深入事物內部，把握事物變化的深層原因。《周易》還要求人們在事物初始階段即能察知苗頭，掌握動向，因而提出了「知幾」這一概念。所謂「知幾」，就是要求人們善於發現事物的各種苗頭，及早提出預警，從而早做準備，防患於未然。《易經》中的占卜之辭，最重要的就是占「幾」，以此求得對某事件發生之前的預測。《周易》之所以要求人們儘可能掌握事件萌芽時期的情況，就是希望能夠預見事物的發展態勢，及時做出應對。從這個角度來看，《孫子》的「知論」與《周易》的「知幾論」也有密切的聯繫。《孫子》的「知論」強調「先知」，在把握事物發展變化規律的同時，更要求預見將要發生的情況，這多少也是受到《周易》「知幾論」的影響。

《周易》對軍事問題進行了深入探討，重視情報、重視先知一向是軍事鬥爭的實際需要。但是在《周易》一書中，由「知」到「戰」的體系構建，並不十分明顯，情報的地位和作用，也不是非常突出。這既是《周易》一書的性質所決定，也是上古軍事思想的初期發展形態所致。繼承相關「知論」，再發展構建「知戰」兵學思想體系等歷史任務的完成，等待著一位傑出的兵學大師的出現。深入總結上古情報活動實踐，系統闡發古典情報理論的任務，都在等待著孫武來完成。

第二章

廟
算



「先計而後戰」的傳統

「廟算」一詞出自《計篇》，是該篇的中心內容，也是孫子的戰略情報分析理論的核心。《計篇》，武經七書本稱《始計篇》^[1]，是十三篇的第一篇，也是最重要的一篇。該篇提綱挈領地說明了全書的中心思想。《孫子》十三篇就是講戰爭問題，研究戰爭之法，中心問題就是「先計而後戰」，也即「知戰」。其中的核心內容，用古代術語來說，就是「廟算」，用現代術語來說，就是戰略情報分析。《計篇》的中心思想就是這個。前面我們已經指出，「知戰」是孫子兵學思想體系的基本內容，《計篇》集中討論的也正是這個內容。《計篇》是十三篇的核心，是總綱。

所謂「先計而後戰」，「計」必須在先，「戰」必須在後。這就是情報先行原則，也就是明代戚繼光所說的「算定戰」。如果「先戰後計」，那就是打無準備之仗，基本是「糊塗戰」。除非是遭遇戰，一般將領都會力爭避免這樣的情形出現。孫子在開篇就強調這個問題，是基於戰爭實踐總結出的經驗之談。孫子雖然標榜和信奉戰爭是詭道行為，但也尊奉一些常規之法，尤其是一些重要的原則問題。正是這個原因，孫子才會在十三篇的開篇就大談「先計而後戰」。



「先計而後戰」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總結出的「兵權謀」流派的特徵。漢代人將先秦的兵學流派根據其特點歸納為「四家」，也稱「兵四家」，分別為「兵權謀」、「兵形勢」、「兵陰陽」和「兵技巧」。四家之中，「兵權謀」是「將帥之學」，約略相當於戰略學。「兵形勢」側重於作戰指揮，注重用兵的陣法和部隊機動，講究精兵銳卒，快速出擊。與「兵權謀」相比較，「兵形勢」似乎可算是戰役學。「兵陰陽」關注天時地利，重視戰機和治軍，其論注入當時的陰陽五行觀念，尤喜「假鬼神而為助」，有其唯心一面，但其推演勝負諸因素之生克關係，似亦存有辯證思維。漢代以後，一些兵書中充斥著很多荒誕不經的內容，比如望氣、遁甲之類，便是「兵陰陽」中糟粕一面的惡性發展。相比之下，「兵技巧」一派則非常實在，他們不尚空談，注重士卒的軍事素質、部隊的訓練教範、戰鬥的隊列行陣及器械裝備的操練。如果說「兵權謀」是「將帥之學」，那麼「兵技巧」則可視為「士兵之學」。

「兵四家」中，「兵權謀」的成就最高，影響最為深遠。《漢書·藝文志》曾這樣總結評價「兵權謀」：

權謀者，以正守國，以奇用兵，先計而後戰，兼形勢，包陰陽，用技巧者也。

1 武經七書本各篇篇題均為兩字，如果加上「篇」字則為三字，這應該是後人加工整理而成的。據銀雀山竹簡文獻顯示，《孫子》故本篇題或為一字或為兩字，並不整齊，十一家注本與其保持一致。日本學者櫻田本一度引起重視，曾被認為是唐以前古本，其單字篇題更多。

由此可見，按照「兵權謀」的相關特徵總結，它不僅層次高，而且包含「兵形勢」、「兵陰陽」、「兵技巧」諸家的學說和思想。^[2]

以往我們習慣把《吳孫子兵法》當成《孫子》，因而把《孫子》當成兵權謀中的第一家。其實《孫子》並不符合「兵權謀」的相關定義，因為《孫子》十三篇中並沒有甚麼「兵技巧」的內容，「兵陰陽」——按照歷史學者李零的研究，最多也只是留有一些「痕跡」罷了。^[3]也就是說，《孫子》十三篇從總體內容上看，並不具備「兼形勢，包陰陽，用技巧」的特徵，《孫子》也應當不是我們習慣認為的那個《吳孫子兵法》。^[4]

《孫子》不符合「兵權謀」當中的「兼形勢，包陰陽，用技巧」的特徵，卻符合「先計而後戰」的特徵，也符合「以正守國，以奇用兵」的特徵。為甚麼這麼說？就是從《計篇》等實際思想內容出發所做出的考察。僅就《計篇》來看，僅就作者將《計篇》作為十三篇的第一篇這種篇次設置來看，《孫子》也是高度強調「先計而後戰」。而《計篇》等篇章都大談謀略之法，正是體現了「以奇用兵」的特點。

這裏所說的「正」與「奇」、「計」與「戰」，是兩組互相對應的概念，這四個概念都值得關注。「正」，這裏指的是守國，而不是治國，這是軍事家和政治家的不同之處。政治家的治國，研究的是治國安邦之策；軍事家的守國，關心的是國家領土安全不受外敵侵犯。為此，「兵權謀」要求軍隊和國防力量的建設不僅要遵循客觀規律，而且更要注重戰略形勢的客



觀分析和理性的軍事決策，在籌劃戰爭與決定是否開戰之時，首先要考量敵我雙方影響戰爭勝負的基本要素，這就是以孫子為代表的「兵權謀家」的「正」。等到實際作戰之時，則格外強調「奇」，亦即強調詭道用兵，注重謀略的運用。「正」，需要的是理性思維和邏輯分析；「奇」，需要的是變異思維和打破常規。「正」與「奇」，反映了兵家在軍事鬥爭的兩個不同方面的特質：一是在戰前的戰略分析和戰爭決策階段，這理所當然地需要強調「正」；二是在戰爭進行過程中的戰場指揮和實施作戰的階段，這順理成章地需要強調「奇」。這兩種不同概念，合在一起又叫「先計而後戰」，有時間上的先後順序。需要說明的是，這裏的「計」，是計算、計數的意思，而非計謀、計策之意，二者意思相近，但是前者可能包含了後者，不可混為一談。

從這個角度來看，我們雖不把《孫子》當成是「兵權謀」中的《吳孫子兵法》，但仍然願意將其認定為「兵權謀」一派，原因很簡單：孫子的兵學思想中明顯體現出「以正守國，以奇用兵，先計而後戰」的兵學特點。

《計篇》開篇便強調戰爭是「大事」：

兵者，國之大事也。死生之地，存亡之道，不可不察也。

「大事」是人們容易忽略的一個詞語。在先秦時代，所謂「大事」是相對固定的，具有特指意義。《左傳·成公十三年》說：「國之大事，在祀與戎。」就是說，古代的國家大事只有兩件：祭祀和戰爭。君主在宗廟祭祀先祖，看起來似乎是迷信，實則是一項重大政治活動，它等於告訴祖先，政權依然在手，國家仍然存在。

除了祭祀之外，另一件大事便是戰爭。無論甚麼朝代，戰爭問題都關係當權者的生死和國家的存亡。正是在這個層面上，古人才把戰爭與祭祀同列為國家的頭等大事。也正是在這個層面上，孫子才說「不可不察」。

2 這種分類按照今天的邏輯學來看，是存在問題的。因為各個子項目並不是對等的，其內涵甚至存在明顯的交叉現象。這種分類，打個比方說，就相當於我們把地球上的人類分作三類：一類是人，一類是男人，一類是女人，其中第一類包含了後面兩類。這樣簡單類比，就可以知道漢代相關兵四家的分類存在問題。

3 李零：《吳孫子發微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97年），頁15。

4 熊劍平：《〈孫子〉著錄考》，載《軍事歷史》（北京：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，2010年），第3期。

一個「察」字，反映出了孫子對於戰爭問題的慎重態度，同時也引出了孫子的戰略情報分析理論。

從總體上看，《計篇》可分為兩大部分。第一部分論述「廟算」理論，用孫子自己的話來說，可以用一個「察」字概括，也可以用一個「計」字（計算、計數之意）來概括。中心內容是「五事」和「七計」，亦即分析敵我雙方影響戰爭勝負的基本方面，論述開戰之前最高統治集團應該怎樣進行戰略情報評估並做出決策，實際上也就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說的「以正守國」。

第二部分論述「詭道」思想。《計篇》中說：「兵者，詭道也。」這是孫子對戰爭的特質所下的定義。所謂「詭道」，絕非單指欺騙或欺詐。誠然，孫子說過「兵以詐立」，但是，這裏的「詭道」含義更深更廣。把詭道狹隘地解釋為欺騙和欺詐，恐怕只是淺層理解。從軍事上說，舉凡非常規之戰法，一切與野戰教範、作戰條例、常規戰術不相脛合，不合常理而出人意料的軍事思維與創造性的作戰指揮，都是「詭道」的內涵。這一部分的内容，用孫子自己的話來說，可以用一個「為」字概括，也可以用一個「戰」字概括。中心內容是「詭道十二勢」（也有人認為是「十四勢」），論述指揮員在戰場上必須因利制權，造勢勝敵，實際上就是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說的「以奇用兵」。

連接「廟算」和「詭道」這兩部分的過渡句是「計利以聽，乃為之勢」，在全篇的結構上起承上啟下作用。我們不可小視這句話，因為它反映了孫子軍事思想中關於籌劃戰爭的不可忽視的程序。這句話的意思是說，經過戰前的戰略情報分析和綜合評估，如果作戰對我方有利且君主採納了意見，那麼下一步才是把會議上分析得出的勝算，通過戰場上的謀略



用兵轉化成為現實。^[5]

孫子注重從總體上籌劃戰爭，首先要把握戰略分析（廟算）和作戰指導（詭道）這兩大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要素。孫子規定的「廟算」，亦即戰略分析，依賴冷靜、客觀、理性的邏輯分析（「計利」），目的是預測勝負。孫子所揭示的「詭道」，亦即作戰指導，需要主觀努力和創造性地謀略用兵（「為勢」），目的是爭取勝利。這兩大要素之間也有個先後順序，必須先「計利」，後「為勢」，這才能把戰前的情報分析預測轉化為戰場上的謀略用兵，而不能邊打邊算，摸著石頭過河。孫子在《形篇》中說：「勝兵先勝而後求戰，敗兵先戰而後求勝。所謂「先勝」，就是戰前即能預見勝利，不打無把握之戰。所謂「先戰」，就是不顧敵情和我情，先打起來再說，一味盲目作戰。程序的先後是思想的反映，到底是先戰還是先算，抑或是邊戰邊算，不分先後，其間有著本質的差異。很顯然，孫子是先「察」後「為」，可以看出孫子對於情報工作，尤其是對戰略情報的高度重視。

5 這句話實際上也可以視作《漢書·藝文志》所說的「先計而後戰」的出處。

「廟算」理論解析

《孫子·計篇》首先集中論述「廟算」，這其實是孫子所說的「察」的具體內容，也是戰略決策和戰略情報分析理論的核心內容。

甚麼叫「廟算」？廟是古代祭先祖、議國是之處，算為籌算、計算、計數之意。上層統治集團於廟堂計議國是、預測戰爭，謂之廟算。大陸學者一般把廟算解釋為戰前最高統治集團舉行的戰略分析會議。從情報學角度來看，「廟算」其實就是在戰略情報分析的基礎上預測戰爭勝負。我們不妨將「廟算」理解為君臣在廟堂之上所進行的戰略分析，是特定歷史時期的術語，今天看來更像是情報學術語。情報類的古軍語很多，「廟算」用於戰略分析之用，顯然是最高層次的一個術語。台灣學者鈕先鍾套用現代西方術語指出：「廟算，用現代術語來說，即為『純淨評估』（net assessment）。」^[6] 這種對應性的解釋，實際上也是視「廟算」為客觀分析。

「廟算」一詞包含如下基本內容：

計算之人，為文武高官。一般是沒資格去的，端茶倒水的資格都沒有。

計算之地，在廟堂。後來改偏堂，因為戰爭之事在古人看來畢竟不是好事。



6 鈕先鍾：《中國古代戰略思想新論》（合肥：安徽教育出版社，2005年），頁29。

計算之物，為算籌。

計算內容，為「五事」。下面將逐一進行解析。

計算之法，為比較，非常直接，非常簡單，同時也非常客觀。計算步驟，先分析，再比較，後綜合評估。計算要求，多算和細算。

計算結果，是一種數量和質量關係。

計算目的，為預見戰爭的勝負。

情報分析的實質是根據所掌握的情況進行科學決策，其中包含有一個工作程序，正如美軍將軍事情報工作視為一個流程一樣。孫子的廟算理論也有一個分析程序，或者叫分析步驟。第一步是逐項分析，第二步是對比分析，第三步是綜合評估。

先說第一步：逐項分析。按照既定的項目逐項分析，也就是「經之以五」。「經」，本為紡織品的縱絲，可訓為測度、根本，即首先要抓住決定戰爭勝負的根本方面進行分析和測算。「五」，又稱「五事」，是指按照性質劃分的五個方面的情報內容，也可以叫五大分析項，這是孫子給出的五大軍事情報範疇，分別稱為「道」、「天」、「地」、「將」、「法」。五大範疇之中，又各有具體綱目，需要逐一分析計算。

下面簡要介紹孫子所規定的情報類別和逐項分析法。所謂「五事」，其實是戰略決策和戰略情報的類別，反映出孫子戰略情報和戰略決策的逐項分析之法。

「五事」的第一個項目是「道」。孫子所謂「道」，不同於道家之「道」。先秦時期，各家都言「道」，但總體上說，以老子和道家之「道」為最高。老子已經將「道」作了形而上的昇華。在很多人眼裏，老子的「道」統攝萬物，「道生一，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萬物」^[7]，「道」是萬事萬物的本源，套用西方術語，老子的「道」是一種本體論。當然，孔子也「志於

7 《老子·第四十二章》。

道」^[8]，有著「弘道」^[9]之志，他們都試圖將「天道」和「人道」哲理化，同時也變成一種生命追求。通過春秋末期這些大思想家的努力，「道」已經變成了中國人的哲思，乃至整個中國古代思想史中一個最重要的範疇。

「道」既是中國古代政治家的追求，也為軍事家所關注。軍事家一直將「道」視為影響戰爭勝負的重要因素之一。相較儒、道兩家，孫子對於「道」也有自己的理解和論述。孫子說：「道者，令民與上同意也。」孫子「道」的範疇，主要是考察民眾對戰爭的態度。民眾是否願意為君主參戰乃至付出生命，這在孫子看來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，甚至可以作為預測戰爭的第一個分析項。很多《孫子兵法》研究專家指出，孫子在進行戰略分析和決策時首先關注影響戰爭的政治因素，也就是戰爭與政治的關係。孫子雖然不是政治家，但在戰爭與政治的問題上確實有自己獨到的見解。孫子雖未涉及戰爭性質問題的討論，但對戰爭與經濟、戰爭與民眾及君將關係等，都有自己獨到的闡發。當孫子將「安國全軍」作為戰爭的出發點之時，尤可以看出其作為軍事家的政治水準。當然，僅從該句「令」字出發，可以看出孫子的立場在「上」而不在「民」。作為軍事家，他所關心的是個「令」字，即為了戰爭勝利，必須要做到民眾和君主的意願保持一致。當然，這其中具體的操作之法，孫子未再論述。大概這些內容是屬於政治部門的事情，既是平時的政治建設內容，也是戰時動員的重要內容。

「五事」的第二個項目是「天」。「天」在古代也是一個極其重要的概念。殷商時期，人們已經開始對「天」進行深入思考，並且把自己的生命與上天聯繫在一起，形成了一種原始的天命觀。《尚書·商書》中說：「我生不有命在天」，便是對於上天的追問。到了春秋時期，思想家已經就

8 《論語·述而》。

9 《論語·衛靈公》。



「天道」、「天命」等問題作了更多深入思考，甚至開始逐步嘗試擺脫天命觀的束縛，這樣便把王朝更替當成了可以接受的事情。

孫子這裏的「天」是自然之天，講「陰陽、寒暑、時制」。該句簡本作：「天者，陰陽、寒暑、時制也。順逆，兵勝也。」相較傳本，多出了「順逆，兵勝也」一句。僅从句式上看，很難和「民弗詭也」相對成文。^[10]日本學者服部千春對「順逆」一詞的解釋是：「大而言之，可釋為戰爭的義與不義，小而言之，可釋為合乎戰爭規律或不合乎戰爭規律。」^[11]由此，他判斷該句與上下文「天時地利」不合，故此也認定為衍誤。筆者認為，「順逆」更像是兵陰陽家的術語。「兵陰陽」與反對「取於鬼神」的孫子的精神是根本違背的，更談不上比傳本「義勝」。簡本中「順逆」一句，當為後人旁注文字衍入。而且這個旁注之人，應該和銀雀山出土的《黃帝伐赤帝》這篇簡文的作者一樣，喜愛兵陰陽家的理論。

「五事」的第三個項目是「地」。對於「地」的解釋，傳本作：「遠近、險易、廣狹、死生也。」簡本作：「高下、廣狹（狹）、遠近、險易、死生也。」傳本、簡本對於「地」的解釋稍有差別。簡本中不僅多出「高下」一詞，「遠近」、「險易」等幾個詞語次序上也和傳本不同。對於多出的「高下」一詞，竹簡整理小組的專家們認為：「孫子於地形甚重高下，簡本義長。」^[12]這種見解無疑是非常正確的，因為孫子確實重視高下。孫子的「轉圓石於千仞之山」^[13]，便是認識到藉助高度可以造勢。因此，孫子認為，如果敵人已經佔領了高地，就不應當派兵去攻打，這便是「高陵勿向」。^[14]

10 褚良才：〈「孫子」辯證四則〉，載《孫子新論集萃》（北京：長征出版社，1992年）。

11 服部千春：《孫子兵法校解》（北京：軍事科學出版社，1987年），頁69。

12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》（一）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96。

13 《孫子·勢篇》。

14 《孫子·軍爭篇》。